

中美文化冷战结束之开端

——“乒乓外交”新探

□ 李洪山

(肯特州立大学 历史系, 美国 俄亥俄)

【内容摘要】对于中美“乒乓外交”这一历史现象, 各界的关注与研究经久不衰。但一些报道与研究一般倾向于仅将乒乓球运动员的互访视为中美领导人为改进两国外交关系而使用的一个工具, 从而忽视了“乒乓外交”作为中美之间自1949年以后第一次文化交流所具有的特殊历史意义, 及其在恢复与发展两国文化关系中所起的实质性作用。本文主要依据政府文献、个人回忆及其他原始资料, 试图从中美两国文化关系的角度对“乒乓外交”做一初步探讨。

【关键词】“乒乓外交”; “乒乓模式”; 中美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李洪山, 美国俄亥俄肯特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主要从事美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研究。

1971年4月11日, 刚在日本名古屋参加完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 包括九名运动员、四名官员及两位随行家属, 从香港经罗湖桥进入深圳, 开始为时一周的中国之旅。一年以后, 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 从而完成了两国之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正式文化交流。“乒乓外交”也从此作为中美关系史上重要的一页而载入史册。

对于“乒乓外交”这一历史现象, 各界的关注与研究经久不衰。从新闻记者的采访与报道, 到政府官员的评论与回忆, 再到专家学者的研究与分析, 林林总总, 既丰富多彩, 又细致入微^[1]。但这些报道与研究一般倾向于仅将乒乓球运动员的互访视为中美领导人为改进两国外交关系而使用的一

个工具, 从而忽视了“乒乓外交”作为中美之间自1949年以后第一次文化交流所具有的特殊历史意义, 及其在恢复与发展两国文化关系中所起的实质性作用。

本文主要依据政府文献、个人回忆及其他原始资料, 试图从中美两国文化关系的角度对“乒乓外交”做一初步探讨。

中美双方在朝鲜兵戎相见的同时, 开始进行文化上的遏制、隔绝与对抗, 即文化冷战。乒乓外交的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为尼克松的访华铺平道路, 而在于打破两国之间为时二十余年的文化上的隔绝与对抗, 开启结束文化冷战, 重建文化关系的历史新阶段。正是因为其所具有的实质性历史意义, 才使得邀请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访华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艰难决

定。而乒乓球运动员的互访不仅打开了中美两国关闭了二十余年的文化教育交流的大门,并且为1970年代的中美文化教育交流提供了一个模式。尽管这一模式具有较大局限性,但仍在中美文化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为最终结束中美文化冷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艰难的决定

基辛格在1970年代末出版的自传中提到“乒乓外交”时,曾十分肯定地写道,中国同美国运动员在名古屋的友好互动和美国队所接到的访华邀请,都是周恩来总理事先精心安排的。他坚持认为,中国运动员们在赴日之前都曾接到对美国友人友好的严格指示,而他们又都具有将“精心的计划表现成率性而为的才能”^[2]。但新近公开的中文资料足以证明,邀请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访华不论对周恩来或者毛泽东而言,都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使这一决定如此难做的主要原因,是中美之间为时二十余年的文化隔绝和对抗,而这种文化隔绝和对抗的局面又是很大程度上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形成的。

面临着文化大革命初期国内外的困难局面,中国领导人从1960年代末开始,争取在国内恢复秩序,同时在国际上扩大接触。为了扩大国际交往,中国政府在周恩来的直接参与下,于1971年2月1日同日本乒乓球协会签订协议,同意参加次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由于这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开始

后第一次派队参加国际性体育比赛,周恩来对参赛的准备和训练都给予高度重视。意识到在赛事中会有同美国队接触的可能性,周恩来于3月11日同外交部和体育运动委员会有关人员举行专门会议,指出:这次派乒乓球队出去,“是代表国家的,也是代表人民的,在比赛中也就要接触许多国家的代表队,其中也会包括美国队”。他认为:“作为一个团体,我们总是要同他们接触的。”他还表示,如果美国队进步,也可以请他们来比赛,“我们可以和美国队比赛,不能来往就不通了”。他最后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体育代表团可以去西德和日本,“那么美国能不能去?”尽管根据逻辑推理,答案应该是清楚的,但谨慎的周恩来并没有将显而易见的答案挑明,他只是要求与会者动动脑筋,想想“这个世界性的大问题”^[3]。

尽管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协议已经签订,但通往名古屋之路仍布满荆棘。不仅党内极左势力竭力阻挠,北朝鲜和柬埔寨流亡政府也都要求中国队不要参赛。面对压力,周恩来不得不于3月14日再次召开会议,讨论中国队到日本参赛是否是不突出政治。在当时的情况下,任何人甚至包括周恩来在内,都可能因所谓的“不突出政治”而导致政治上的灾难。由于巨大的政治风险,会上无人敢明确表态。无奈之中,周恩来让与会人员立即把中国乒乓球队运动员和工作人员从睡梦中唤醒,凌晨开会征求他们的意见。结果大多数运动员认为,出于政治考虑中国队不应参加本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又重新召开有关干部会议,

经长时间讨论,终于达成了中国队应去日本参赛的一致意见。会后,周恩来将结果以亲笔信形式报告给毛泽东^[4]。

毛泽东很快批准了周恩来的建议。但与此同时,他还圈阅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关于参加第31届锦标赛准备工作的报告。该报告明确规定,同美国代表团官员相遇时,不主动交谈和寒暄。同美国队进行比赛时,赛前不交换队旗,但可握手致意。可能正是由于这些由乒乓球队提出并经毛泽东批准的严格规定,周恩来在启程前一天晚上接见代表团时,对中美关系避而不谈。不过,他仍鼓励大家在各个战场都要争取友谊,提醒代表团在对外宣传上不要强加于人,并建议大家研究一下到日本下飞机时是否每人手里都要拿一本《毛主席语录》。遵照周恩来的建议,中国代表团在日本访问比赛期间,在公开场合都没有人人手持一本“红宝书”。这不仅有利于改进中国代表团的形象,而且也为中外运动员互动提供了方便。

在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中美乒乓球运动员和乒协官员首次发生接触。尽管中国运动员和官员都严格遵守规定,不主动同美国运动员和官员寒暄,但在美国人首先打过招呼后,他们并没有拒绝同美国人互动。中国代表团负责人宋中于3月30日同美国代表团团长格兰姆·史丁赫文(Graham Steenhoven)有过两次短时间交谈。在交谈中,史丁赫文告诉宋中美国政府已于3月15日取消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旅行禁令,并对美国运动员因旅行禁令未能参加1961年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深表遗憾。他希望美国队将来能有机会到中国参加比赛。中国代表团官员不仅将同美国代表团的所有互动每日数次及时上报北京,而且还经过分析得出结论:美国代表团想访问中国。他们于3月30日要求北京就此给予明确指示^[5]。

中国政府的最初反应是负面的。外交部和国家体委于4月4日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请示报告》。其主要理由是“美左派和有影响的人物均尚未访华,由乒乓球队打头阵,政治上不很有利”。根据数月前毛泽东同埃得加·斯诺的谈话,外交部已制定计划将首先邀请美国有影响的新闻记者和政治领袖访华。周恩来对外交部的考量心知肚明,因此,对外交部和国家体委的报告“拟同意”,并报请毛泽东审批。但他同时在报告中加进一段话,要求留下美国代表团的地址,并对美国首席代表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原则立场^[6]。显然,周恩来一方面在尽力保留今后邀请美国运动员访华的机会,另一方面采取谨慎措施证明自己坚持中国对美一贯政策的立场,不给自己的政治对手任何可乘之机。

即使对一言九鼎的毛泽东,是否邀请美国队访华也是一个罕见的难题。他在收到报告后反复考虑了两天,直到4月6日晚才圈阅批准,退回外交部照办。其间,他十分关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名古屋同美国运动员的互动,要求代表团将电话汇报由每日三次增加到每日五次。他在看到庄则栋同美国运动员格兰·柯恩(Glenn Cowen)交谈并互赠礼品的报道后,称赞庄

则栋不仅会打球,而且懂外交。但在当晚服用过安眠药后,毛泽东突然要身边工作人员吴旭君立即通知外交部邀请美国队访华。由于毛泽东同身边工作人员事先有约定,用药后做出的决定不算数,因此,吴旭君等毛泽东再次催问并明确表示他的最新决定有效后,才将他的指示于半夜时分传达给外交部。外交部在把毛泽东的决定报告给周恩来后,立即通知乒乓球代表团,邀请美国队回国时顺访中国^[7]。

周恩来所表现出来的极度慎重和毛泽东一日之内对自己所做决定的推翻,证明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对这两位领导人都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决定。为什么这个决定如此难做?为什么最后只有毛泽东一人能够就派遣乒乓球代表团赴日比赛和邀请美国代表团来华访问之事拍板?要想得到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有必要对中美两国在冷战中的特殊经历,以及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这一特殊经历的形成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进行简要回顾和分析。

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冷战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盟友之间进行的不以战争为手段的全球性斗争。双方的对抗主要集中在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1950年代中期以后,更是以扩大文化、教育、艺术等方面的交流和渗透作为斗争的重要手段。中美之间的冷战经历则大相径庭,双方不仅在朝鲜和越南兵戎相见,而且在文化教育战线互相遏制、孤立与对抗。中美两国在文化教育战线上的对抗比双方血腥的军事较量为时更长,也更彻底。这无疑是中美冷战的特殊性之所在。

中美两国在文化上的对抗与在朝鲜的军事交锋同时展开。1950年10月26日,也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发起第一战役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这一由中央宣传部起草,经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修改批准的文件,明确规定了宣传的内容、方法、重点与目的。其基本内容有两个:一是对美军扩大侵朝不能置之不理,二是使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8]。同年11月12日,北京市委就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情况向毛泽东提交报告,建议把肃清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影响、肃清部分群众中的崇美和恐美心理、孤立打击亲美分子作为继续推动运动发展的中心。毛泽东当日即将该报告转发全党,并亲自加上批语,明确指出北京市委的报告是正确的,并要求各地“照着这个方向去做”^[9]。1951年2月28日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将抗美援朝宣传教育运动列为八项要点中的第二点。要求全党“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这个运动,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10]。

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反对美国文化侵略及清除美国对华思想、文化、教育、宗教等各方面影响的群众性运动。不仅所有美国教会和私人团体在华开办的学校、医院、教堂、慈善机构等全部被接管,而且广大知识分

子,尤其是有留美经历的学生和学者,都被迫参加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大、小会议上的批评和批判,以及“洗澡”“过关”等各种方式,彻底清除美国文化对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教学、科研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周恩来本人还亲自于1951年9月29日在天津给京津高校知识分子代表做报告,结合个人亲身经历,阐释知识分子改变思想、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1]。在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全力推动下,全国性的思想改造运动迅速走向高潮。很快,几乎所有美国传教士、教师、医生、学生、商人等都被迫返国。美国的电影、广播、报刊、书籍、音乐等文化媒介几乎一夜之间从中国消失。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开始采取类似行动。它一方面下令禁止教会、慈善及其他组织给在中国的学校和医院等机构汇款;另一方面拒绝让在美国学习科技、工程和医药的中国学生回国。从此,中美两国间的文化教育关系被完全切断,取而代之的是文化上相互隔绝,对抗与攻击^[12]。

虽然中美双方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于1953年7月正式停止,但中共领导人对彻底清除美国对华文化影响的努力不但没有终止,反而不断加强。在毛泽东领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从批判胡风,到反右运动,再到文化大革命,都无不以扫除美国影响、防止“和平演变”为主要目标。无数知识分子或因在美国留过学,或因同美国教育科研机构有过某种工作关系,或因工作和生活方式被指受美国影响,而在历次运动中惨遭打击和迫害。

到1970年代初,美国及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化媒介等,都早已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最危险的禁区。甚至连周恩来在处理有关美国的问题时都不得不格外谨慎小心。只有毛泽东,因其无与伦比的声望与地位,在处理中美关系事务中享有最大的决断权。因此,凡是有关中美关系的重要决策,都必须由毛泽东最后拍板。

1969年中苏之间发生的武装边境冲突,以及此后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界的大规模兵力集结,迫使毛泽东重新调整同美国的关系,以改变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当美国政府于1969年12月提出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积极响应,指示驻波兰大使馆代办雷阳,同美国大使沃尔特·斯拖塞尔(Walter Stoessel),于1970年1月和2月在华沙分别进行第135和136次大使级会谈。在136次大使级会谈中,中方就美方在前次会谈中提出的“高层会谈”建议做出回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方明确表示如果美国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商谈,中国政府愿意接待^[13]。虽然,中美大使级会谈因柬埔寨政变和美国入侵柬埔寨而中断,毛泽东并未放弃中美高层会谈的可能。他于1970年夏邀请著名记者斯诺访华。在12月18日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表示他愿意同尼克松当面谈,并对现行的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的政策是否正确表示怀疑和否定。他要求外交部研究一下,请左中右不同政治派别的人到中国来。为了促使尼克松访华,毛泽东还同意不将解决台湾问题作为先决条件^[14]。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外交部于1971年2月拟定了一个邀请美国人的名单,先以左派和中派为主,后又增加右派人士。很明显,不论毛泽东还是外交部的官员,对邀请美国各派政治人物、外交官员和新闻记者访华都已没有任何问题。他们未曾考虑到的是邀请普通美国民众,包括体育运动员访华。

从理论上讲,邀请美国运动员访华不应该有任何问题,因为运动员代表美国人民而非政府,而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要把美国人民与美国政府区别开来。1971年12月2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不仅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幅照片,而且还在右上角摘引了一段毛泽东语录:“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中国政府自1949年以来并未认真执行这一政策。相反,在反对美国文化和教育侵略的口号下,几乎所有在华进行文化教育活动的美国人都被迫离开中国,尽管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普通民众。因此恢复中美民众之间的文化交流,直到1971年春都不在中国领导人的战略考虑之中。在对美国文化的批判与围剿达到登峰造极的文化大革命中,邀请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访华自然成为摆在周恩来和毛泽东面前的一道难题,因为美国运动员的到访将意味着对中美之间持续了二十余年的文化隔绝与对抗的否定,而毛泽东和周恩来正是这种隔绝与对抗的始作俑者。

二、历史性转折

以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访华为开端的

两国间自1949年以来首次文化交流,随着中国乒乓球队对美国的成功访问而圆满完成。由于双方参加互访的人数十分有限,互访的时间也较为短暂,因此,“乒乓外交”只是中美两国为恢复文化关系所迈出的一小步。但是,这一步标志着中美文化关系史上又一重大转折的开始。正是通过对乒乓球运动员的接待安排,中美两国政府开始扫除各种阻挡文化交流的障碍。更为重要的是,乒乓球运动员的互访给两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他们公开修正长期推行的文化隔绝和对抗政策,并表明各自不再把对方的文化或民众视为洪水猛兽而完全拒之门外。

对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友好接待是中美文化关系的转折点,而这一转折的实现确实是在周恩来精心组织和安排下完成的。美国代表团尚未过罗湖桥,周恩来就通过秘书要求负责接待的中国对外友好协会负责人陪美国客人吃晚餐。当晚,周恩来又通知要安排美国运动员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第二天,他特意吩咐负责主持中美友谊赛的丁西林,在同美国队比赛时,“要预先通知[观众],应该鼓掌的还是要鼓掌”。他还强调:“和美国队比赛,不要光是我们赢。”在电台和电视台实况转播中美乒乓球赛前,周恩来仔细审阅并批准了广播稿,其中包括“长期以来,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是友好的,这次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我国,将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等热情友好的字句^[15]。除了参加表演赛外,美国运动员在华期间还参观了天安门、颐和园、长城、清

华大学、工业博物馆、人民公社等。正是在周恩来的亲自组织安排下,美国运动员每到一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让他们深深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高潮是1971年4月14日同周恩来的会见。尽管这次会见相对短暂,但周恩来在同运动员的交谈中传送了许多重要信息,清晰地反映了中美文化关系的历史性转折。首先,周恩来一开始就热情地对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16]他是在用这句“中国古语”向客人明确表示,美国运动员和人民是中国的朋友。然后,他告诉客人,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访华只是开始,将来更多美国人,包括记者,会有机会访问中国。周恩来还在会见中清楚地表明了对美国文化的开放态度。当柯恩问周恩来对美国青年中流行的嬉皮士运动有何评论和看法时,周恩来告诉柯恩,他认为这是青年人“寻求真理”的一种形式,他自己年轻时也是这样,因此他赞成青年有探讨真理的要求。最后,周恩来对1949年以前中美两国文化关系做了较为客观的回顾与评估。他指出:“中美两国人民过去来往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在这里他既没有使用标准的官方说法,把中美文化交流称为美国对华文化侵略,也没有谈及谁应该为中美文化交流的中断负责任。显然,他是想放弃对历史恩怨的纠缠,尽快恢复中美文化交流。因此,他称赞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并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

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17]。

在向美国客人传达上述信息的同时,周恩来没有忘记让中国乒乓球队明确接到回访美国的邀请。尽管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从一开始就表示欢迎中国朋友访问美国,但他的表述并未使周恩来感到是对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的明确邀请,尽管美国队在访华前就为中国队的回访找到了资助单位。美国队领队杰克·霍华德(Jack Howard)出来补场,他对周恩来清晰地表示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能够在最近的将来访问美国。为了保证该邀请的有效,细心的周恩来坚持要从团长斯廷霍文那里得到确认,直到他十分肯定地说“同意”,周恩来才满意地结束会见^[18]。显而易见,周恩来是想通过乒乓外交打开双向文化交流的大门。

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的访华及同周恩来的会见促使美国政府采取必要措施,为中国乒乓球队的回访提供法律上的保障。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早在1970年1月1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欢迎同中国进行包括学生、医生、记者等在内的人员交流^[19]。在同年2月举行的华沙大使级会谈中,美方也表达了开始文化交流的愿望。尼克松总统更是在2月25日提交给国会的年度外交政策报告中,明确表示“将仔细研究究竟应采取何种步骤为中美民众之间的接触提供更多的机会,并为实现这些机会扫除那些毫无必要的障碍”^[20]。但是直到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美国政府并未就保证中国人合法入境采取任何具体措施。在周恩来会见美国乒

乓球运动员的当天,尼克松才发表声明,公开表示美国将尽快为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者办理签证,并允许中国使用美元^[21]。尼克松的这些命令终于为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访问美国扫除了最后的障碍。

在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之前,尼克松总统完成了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之行。尽管尼克松在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之后访华,但其计划、沟通和安排从1970年秋就已开始。早在1970年10月,尼克松就分别托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罕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转告北京,他希望改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并愿派特使访问北京。周恩来在11月21日答复,如果美方真有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中国政府欢迎尼克松的特使或尼克松本人来北京商谈”^[22]。1971年4月,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再次向尼克松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愿意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或总统本人。尼克松接受了中方邀请,并派基辛格于1971年7月秘密访问北京,为他的中国之行做前期准备。

尼克松的访华不仅使中美双方为实现“高层会谈”所进行的为时两年的努力有了圆满结果,而且对保持“乒乓外交”的势头,扩大两国文化交往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在1972年1月6日同由亚力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率领的先遣队举行会议时,周恩来请白宫新闻发言人让·齐格勒(Ron Ziegler)转告美国乒乓球协会,中国代表团希望能在春暖花开的时候访问美国^[23]。美国乒乓球协会和白宫都为长期没有听到中国乒乓球队访美的信息而担心了很长一段时间,周恩来的通知终于让他们

都松了一口气。在尼克松1972年2月的中国之行中,虽然台湾、越南和苏联问题是中美领导人会谈的主题,但两国之间的人员交流以及乒乓球运动员的互访也在他们的视野之中。在2月21日同尼克松的会见中,毛泽东回顾了中美关系自1949年以来的发展历程,不仅承认了中美两国怪得很,在过去二十二年里总是谈不拢的事实,而且罕见地代表中国政府做了自我批评。他自称在过去十几年里拒绝美方提出的人员来往、坚持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的做法不对。“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于是打乒乓球”^[24]。由此可见,打乒乓球虽是一件小事,但它标志着毛泽东对由他本人参与制定的针对美国的文化对抗政策的否定。

毛泽东对两国乒乓球运动员互动的支持,不仅导致了中国对美文化政策的巨变,而且对尼克松访华的成果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为了准备同美国领导人的会谈,周恩来于1971年5月就在中共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个《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提出了同美国谈判的八项原则。前四项都同台湾问题有关,但没有一项提及人员交流。因此,在中方为中美联合声明提供的初稿中,只有一句话用含糊的字眼提到文化和贸易关系。不过,当美方坚持要在联合声明中就文化交流加进一个实质性段落时,中方并没有提出异议,其主要原因就是毛泽东对乒乓球运动员的互访表示了明朗积极的态度。因此,在1972年2月27日于上海公开发布的联合声明中,双方在列举了一系列问题上的不同原则立场后,明确表示扩大两国人

民之间的了解是两国共同的意愿,并承诺将采取措施进一步发展两国在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领域的接触与交流^[25]。因此,同两国政府在台湾等问题上的巨大分歧相比,中美双方在发展文化关系上达成的共识是尼克松访华的最大亮点。

尼克松把同中国政府达成发展文化关系的共识视为其中国之行的最大成就,并决心兑现自己所做的承诺。在欢送他回国的仪式上,尼克松发表讲话告诉美国公众,他并没有带回任何成文或不成文的保证和平的协议,但是,他宣布在几个领域有了必要和重要的开端。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我们已就扩大中美两国人民在文化、教育和新闻方面的接触达成了协议。”^[26]为了落实有关交流的承诺,尼克松于1972年3月9日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如何执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新闻等方面的交流做一个研究报告^[27]。相反,对于中美高峰会谈的重点——台湾问题,尼克松则一直等到1974年3月,整整两年之后,才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如何调整而非减少美国在台军事力量^[28]。

为确保中国乒乓球队回访顺利,尼克松和基辛格在中国之行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基辛格在3月中旬亲自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官员,确保该委员会为中国乒乓球队访美准备的资金已经到位。3月20日,专门负责接待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的尼克松的私人代表约翰·斯卡力(John Scali)同基辛格的助手理查德·索罗门(Richard Soloman)一道,与由美国乒乓球协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组成的联合

委员会开会,商讨中国队在美行程。正是由于白宫的直接干预,不仅打破了美国右翼组织邀请台湾乒乓球代表团同时访美的企图,而且最终迫使国务院同意为中国乒乓球队提供安保服务^[29]。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终于在1972年4月12日开始对美国的回访。对于乒乓球代表团的美国之行,中方同样做了精心准备。周恩来不仅亲自审批了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关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回访加拿大、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报告,而且建议在男女运动员中换入几位知名队员,以表重视,并有利于扩大影响^[30]。作为1949年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中国团体,代表团的行程包括底特律、威廉斯堡、华盛顿和洛杉矶等地。几乎每到一地,他们都到大、中学校参观,并同当地学生进行友谊比赛。4月18日,代表团应邀访问白宫并会见尼克松。在欢迎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的讲话中,尼克松承认在乒乓球比赛中会有输赢,但他指出:“由你们开启的两国民众之间的接触有一个最大赢家,那就是美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两个伟大人民之间的友谊”,他强调道:“将意味着为世界和平带来更好的前景。”^[31]

尼克松之所以能够如期在白宫会见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完全是毛泽东再次亲自干预的结果。从1972年4月初开始,美国扩大了对越南北方的轰炸。4月16日,河内、海防等北越主要城市再次被轰炸。应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的要求,周恩来于4月18日凌晨召集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是否

应按原计划会见尼克松。会后,周恩来报告毛泽东拟根据会议讨论结果通知在美人员因美国对北越的轰炸,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将取消4月18日同尼克松的会见。毛泽东立即会见周恩来,指出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访美是非官方性质,美国运动员去年访华时同中国领导人见了面,如果中国队拒绝同美国总统见面会给美国民众留下不讲礼貌的印象。因此,他决定中国乒乓球队原定行程不变。遵照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修改了发往美国的口头指示,中国乒乓球队终于得以按原计划会见尼克松并参观白宫^[32]。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及时决定,中美之间自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文化交流才得以圆满完成,两国文化关系史上的又一次历史性转折才得以正式开始。

三、“乒乓模式”

乒乓球运动员的成功互访不仅为中美两国重建文化关系打开了大门,而且为此后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基本模式。“乒乓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政府主导、民间实施、短期交流。从1971年到1979年,数以千计的科学、技术、教育、医药、体育、艺术等各界人士以个人或团体的方式横跨太平洋,成为恢复中美文化交流的先行者。尽管参加交流的人员众多、领域广泛,但他们所仿照的都是同一个基本模式,那就是“乒乓模式”。有些美国学者,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前主任玛丽·布拉克(Mary Bullock)认为,中美早期文化交流的架构是在美苏、美台和美港等

各种不同交流模式影响下形成的^[33]。此说虽较能反映美方的设想,但同运作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尽管“乒乓模式”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它兼顾了双方的立场,而且明白易行,因此为两国间文化交流的迅速恢复和扩大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为最终结束中美之间以隔绝和对抗为标志的文化冷战奠定了基础。

“乒乓模式”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其“非官方”性质。从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开始,中方就坚持中美文化交流必须以民间方式进行,以避免在美国尚同台湾维持外交关系的情况下造成“两个中国”的印象。因此,尽管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最终由毛泽东做出,但出面向他们发出正式邀请的是中国乒乓球协会。此后,美国科学、技术、教育、医学、体育和艺术团体的访华,也都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及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等所谓非官方机构负责邀请和接待。中国代表团访美也按此原则安排。外交部和中国科学院在1972年夏向国务院提交的一个有关派遣科学家代表团出访美国的联合报告中,就明确建议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义组团,并强调作为非官方代表团,在美国将尽量避免同政府部门打交道,同政府官员接触时将尤其小心,以表示对建交国与非建交国的区别对待^[34]。

以非官方形式进行文化交流不仅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也是美国民间团体的要求。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一接到访问中国的邀请,就立即着手从其他民间团体寻求财政资助。他们在踏入中国的前一天,终于

收到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电报,承诺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美支付所有费用。正是有了该委员会的承诺,美国乒乓球协会才能够在会见周恩来时正式邀请中国队回访美国^[35]。在完成接待中国乒乓球队的工作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立即分别向白宫提交了立场陈述书。它们建议应采取措施为中国乒乓球队访美后即将开始的文化、教育交流做准备,并要求美国政府在进行有关谈判时顾及民间组织的立场。它们认为美国是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寻求同中国建立关系的个人与团体具有不同的动机与利益,因此交流的形式与内容不应由在巴黎进行的双方大使级谈判来决定,而应由实际参与交流的非政府机构来掌握。它们还提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交流与联系不应被任一官方或私人机构所垄断^[36]。

基辛格对上述两个团体的立场和建议表示同意。他在给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艾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的回信中,承诺让他手下参与中美文化交流工作的官员熟悉艾克斯坦的想法。他同艾克斯坦分享了白宫的看法:中国将会以缓慢而又稳健的方式开展同美国的文化交流。他还告诉艾克斯坦中国领导人对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都有所了解,部分原因是因为前者在接待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后者在安排中国医学代表团访美中所起的作用。他希望这两个组织都能在以后的中美文化教育交流中,同他手下的

工作人员保持密切联系^[37]。基辛格的希望得到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等参与交流的民间组织的响应。虽然这些组织在确定交流项目和选择交流人员上都保持独立性,但都同美国政府密切合作,并经常通过国务卿和其他外交官员向中方陈述各自的交流计划和所关心的问题^[38]。

尽管两国文化交流的具体组织与实施民间团体负责,但战略性决策和全局性协调仍由政府掌握。这是“乒乓模式”的另一大特征。为保持和扩大中美文化交流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美后的势头,美方于1972年11月通过巴黎渠道向中方提出1973年的交流设想。然后双方外交官员利用基辛格率团访华的机会,于1973年2月17日在北京举行专题会谈。代表美方与会的是国务院中蒙事务主任阿尔弗利德·束肯斯(Alfred Jenkins),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理查德·肯尼迪(Richard Kennedy)和所罗门。中方则由外交部部长助理章文晋率助手和译员参加。在会谈中双方就交流项目的数目、内容、时间、顺序、特殊要求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和沟通。最后,双方不仅就近期交流项目取得一致意见,而且同意在文化交流的组织安排上实行“双轨制”的同时,寻求两国政府间原则上的一致^[39]。两国政府都积极干预文化交流,但它们各自的影响力相差甚大。美国政府在取消了对中国的旅行限制后,对各界人士组织具体文化交流项目的影响比较有限,只能通过同中国政府的谈判尽可能地帮助民间团体和个人实现他们的

交流计划,同时也争取达到自己预想的政治目标^[40]。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对中美文化交流的影响和控制要全面和严格许多。它不仅对中方所有交流项目和人员握有绝对控制权,而且还通过对签证的发放、访问团体的审批、旅行接待的安排等方面的严密掌控,对美方提出的交流项目也拥有较大的决定权。因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弗朗克·普莱斯(Frank Press),在1970年代中期召开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抱怨道:“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来访者有很高的选择性,美方试图建立平衡且能反映美国利益的交流计划的努力并不成功。”^[41]

政府,尤其是中国政府,对中美文化交流的控制和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对交流的内容和方式的规范与限制上。在恢复文化关系的初期,美国学术界期望能够在中美之间建立全面、对等的交流,以满足各界不同的需求。例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在1972年6月访华时就直接向周恩来建议中国派留学生到美国学习英语。美国官员在1973年2月同中方的谈判中,又转达了哥伦比亚大学提出的接受中国语言学生的计划,并建议中国学者到美国进行多方面的科研合作^[42]。在1973年11月11日于北京举行的中美两国政府有关文化交流和经济关系的会谈中,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阿瑟·哈穆尔(Arthur Hummel)更明确表示,华盛顿希望除了接待中国小型代表团讨论科技问题外,还希望看到更多能够面对美国大众的艺术表演团体。对美

方提出的选派学者和学生到美国研究和学习的建议,中方一再以台湾问题尚未解决,中美仍未建交为由而加以拒绝^[43]。虽然中方同意在1974年选派武术代表团访美,但在同年派往美国访问的其余九个代表团都来自科学、技术、农业和商业等领域。正是在中方的坚持下,中美两国文化交流在1978年底以前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和医学等领域,而且只能以两周到六周短期“学术旅游”的形式进行。这是“乒乓模式”的第三个特征。

仿照“乒乓模式”进行的中美文化交流,一方面打破了中美两国之间二十余年来的文化隔绝与对抗的局面,开始了文化关系的重建;另一方面,又由于中美尚未恢复正式外交关系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表现出严重的历史局限性。在中美1979年正式恢复外交关系前,有一万多名美国各界人士和近千名中国各界人士,参与了中美文化交流。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一个机构就组织和接待了七十多个中美学术交流团体。其中,自然科学占绝大多数,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交流团体屈指可数,而且都是美方在经过艰难争取后才得以成行^[44]。虽然美国费城交响乐团于1973年9月成功访华,但江青于11月18日在周恩来已经批准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道:“建议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其后果是严重的!”同时她还同张春桥、姚文元一道在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发起批判资产阶级无标题音乐的运动^[45]。周恩来曾经试图借助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杨振宁、李政道等的

影响力,根据他们的建议要求科学院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并指示教育部门允许部分中学生直接上大学,甚至选派研究生到美国进一步深造。但他的努力也都因遭到党内极左势力的抵制和攻击而无一成功,他本人也在1973年底更因所谓处理对美关系失当而在党内受到批判^[46]。因此,中美文化交流在1978年底以前始终无法超出“乒乓模式”的局限。

尽管“乒乓模式”具有严重历史局限性,但它仍然为中美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通过乒乓球运动员互访后长达数年的文化交流,官方和民间的沟通渠道都已疏通,组织和协调交流的机构都已建立,双方负责交流的单位和个人相互有了一定的了解。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四人帮”的被捕、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及邓小平的再次复出,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终于得到正式恢复,文化交流也很快进入了全面、深入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关于向美国大量派遣留学人员的决定,就是通过1978年6月到访的美国总统科学顾问普莱斯直接通知美方的。最先得到消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立即按照普莱斯的建议开始筹划中美大规模教育交流,并邀请多所大学负责人开会商讨接受中国留学人员事宜^[47]。第一批五十名由中国政府派遣与资助的中国学生和学者于当年12月底到达美国,开始为期一年或更长时间的研究与学习。中美文化交流的“乒乓模式”从此被打破。1979年初,中美两国政府在建交后立即正式签订了科技、教育和文化交流协定。当年中国派往

美国的留学生就超过了一千三百人,1980年则跃升至四千三百余人,远超1949年前最高人数^[48]。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恢复了同中国的富布莱特计划。十一位美国学者和六位中国学者于1980年参加了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富布莱特交流^[49]。在政府与民间的共同推动下,双方文化交流的范围不断扩大,涵盖了几乎所有领域,其中包括曾经是禁区的人文、社科、艺术、电影、电视、广播等。到1988年,中国留美学生已近三万人,美国成为接受中国学生最多的国家,而中国学生也开始成为美国最大的外国学生群体^[50]。至此,中美之间的文化冷战终于成为历史,而文化交流则重新成为两国关系中发展最快、影响最深,且最富韧性的纽带。

“乒乓模式”在1970年代末因不再能满足双方文化交流发展的需要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乒乓外交”作为中美关系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页将永远载于史册。中美乒乓球运动员在四十年前的互访,不仅打破了两国之间长达二十余年的文化隔绝和对抗,而且为恢复和重建双方文化关系,最终结束文化冷战创造了条件、铺平了道路。中美之间自乒乓外交开始的重建文化关系的经历清楚地证明,在具有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间进行文化交流不仅可行,而且有益。长期的文化隔绝和对抗同军事战争一样会给国家、民众和社会带来惨重的破坏和损失。对前者所造成的破坏的修复和重建往往要比后者更为困难和艰巨。为因应中美文化冷战,或以因应文化冷战为名而建立的政府和执政党对

思想、文化、教育、艺术等的全面控制并没有因中美文化冷战的结束而终止,就是最明显的例证。“乒乓外交”开启了恢复和重建中美文化交流的历史新阶段,并最终迎来了文化冷战的结束,但要彻底医治由文化冷战所造成的创伤,还需要比“乒乓外交”更大的智慧和更多的努力。//

注释:

[1] Henry Kissinger, *The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9; 钱江:《“乒乓外交”始末》, 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 (1949-1972)》,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Xu Guoqi, *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 Henry Kissinger, *The White House Years*, p. 709.

[3] [5] [15] 钱江:《“乒乓外交”始末》第15-22、60-61、88-93、152-158页, 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43-444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钱江:《“乒乓外交”始末》第68-73页, 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6] [13] 程远行:《新中国外交斗争追忆》第106-108、122-123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7] 林克、吴旭均等:《历史的诚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第126页, [香港] 荔文出版社1995年版。

[8]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1950年10月26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436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第655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43页,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1]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载何东昌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第1卷)第119-122页, 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12] Hongshan Li,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 State, Society, 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905-1950*,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69-175.

[14]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2-594、595-596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16] [17]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编:《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69、470-474、471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19]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News Conference, January 18, 1971,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January 1971, p. 153.

[20] Richard Nixon, “Annual Foreign Policy Report”, March 22, 1971, *ibid.*, p. 334.

[21] “President Nixon Eases Restrictions on Mainland China Trade and Travel”, April 14, 1971, *ibid.*, p. 567.

[22] [23] [30] [32] [34] [45] [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15、509、515-516、519-520、557、633、472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25] “Text of Joint Communiqué, Issued at Shanghai, February 27,”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March 20, 1972, pp. 435-438.

[26] “Remarks by President Nixon, February 28, 1972,” March 20, 1972, *ibid.*, p. 434.

[27]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148” March 9, 1972,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Institutional Files*, Box H-207, The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Yuba Linda, California.

[28]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248” March 14, 1974, *ibid.*

[29] [35] Xu Guoqi, *Olympic Dreams*, pp. 152-155, pp. 148-150.

[31] “Remarks by President Nixon, April 18, 1972,”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April 17, 1972, p. 498.

[33] Mary Brown Bullock, “Scholarly Exchange and American China Studies”, David Shambaugh, Ed.,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993, pp. 282-284.

[36] “Memorandum for Henry Kissinger from John Holdridge,” August 29, 1972,”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Project, White House Central Files, Subject Files, FO Box 5, The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Yuba Linda, California.

[37] “Letter from Henry Kissinger to Alexander Eckstein,” September 6, 1972, *ibid.*

[38] Mary Brown Bullock, “Mission Accomplished: The Influence of CSUPRC on Educational Relations with China,” Cheng Li, ed., *Bridging Minds across the Pacific: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 1978-2003*,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05, pp. 62.

[39]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Chang Wen-chin and Alfred Jenkins, February 17, 1973,”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iles, Henry A. Kissinger Files, Country Files—Far East, Box 86, The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Yuba Linda, California.

[40] Mary Brown Bullock, “Scholarly Exchange and American China Studies,” p. 287.

[41] Frank Press, “Scholarly Exchange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Recent Experience,” John K. Fairbank, ed., *Our China Prospects: A Symposium*,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2007, p. 40.

[4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Chang Wen-chin and Alfred Jenkins, February 17, 1973,”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iles, Box 86.

[4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Chang Wen-chin and Alfred Jenkins, February 17, 1973,” *ibid.*

[44] Mary Brown Bullock, “Mission Accomplished,” pp. 51-53.

[47] Mary Brown Bullock, “Mission Accomplished,” pp. 54-55.

[48] Leo A. Orleans,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Policies, Issues, and Number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8, p. 88.

[49] 檀有志:《美国对华公共外交战略》第189-195页, 时事出版社2011年版。

[50]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pen Doors*, (1988-1989), 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989, p. 8.